

后浪

古典传统

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美) 吉尔伯特·海厄特 (Gilbert Highet) 著 王晨 译

刘小枫 雷立柏 哈罗德·布鲁姆 序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Greek and Roman Influences on Western Literature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古典传统

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美) 吉尔伯特·海厄特 (Gilbert Highet) 著 王晨 译
刘小枫 雷立柏 哈罗德·布鲁姆 序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Greek and Roman Influences on Western Literatur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典传统 / (美) 海厄特著; 王晨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7
ISBN 978-7-5502-5840-2

I . ①古… II . ①海… ②王… III . ①文学史—西方国家 IV . ① 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5060 号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Greek and Roman Influences on Western Literature
by Gilbert Highet

Copyright 1949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renewed 1976 by Gilbert Highe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Post Wave Publishing Consulting (Beijing)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POST WAVE PUBLISHING CONSULTING (Beijing)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古典传统

著 者: (美) 吉尔伯特·海厄特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 吴兴元

策划编辑: 张 鹏

特约编辑: 张 鹏

责任编辑: 赵晓秋 王巍

封面设计: 周伟伟

版面设计: 罗志伟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800 千字 720 × 1030 毫米 1/16 40 印张 插页 2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5840-2

定价: 78.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海伦，你的美在我眼中
就像昔年尼西亚的帆船，
在馥郁的海上轻柔地
载着困倦思乡的游子，
带他回到故国的海岸。

我在绝望的海上漂泊了太久，
你风信子色的青丝，你古典的脸庞，
你水中仙子的绰约召唤我回家，
回到从前希腊的荣光，
和往昔罗马的盛况。

——爱伦·坡《致海伦》

中译本序一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欧洲文明是一个统一、连贯的文明单位——其实，不仅我们中国人的印象如此，西方人自己的印象同样如此。显然，这种印象是由西方文明通史或西方文学通史或西方哲学通史一类史书塑造出来的，如本书作者（生前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海厄特在“导言”一开始所说，“就我们大部分的精神活动而言，我们是罗马人的孙辈，是希腊人的重孙”。

当然，我们也知道——西方人更清楚，历史上的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与公元五世纪前后才移居西罗马帝国领地的欧洲人并非同一个“民族”。欧洲人向西移居西罗马帝国领地时，还是尚未开化的“蛮族”。用海厄特教授的话说，正是由于这个“蛮族”的入侵，“高贵而复杂”的古希腊—罗马文明“走向覆亡”，“被淤泥覆盖、掩埋，乃至忘却”。不过，海厄特又说，“当西方文明开始复兴和重塑自身的时候，它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重新发现被掩埋的希腊和罗马文化”。海厄特显然是出身为“蛮族”的欧洲人的后裔，而非古希腊人或罗马人的后裔，但“西方文明”这个概念使得他可以把欧洲人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维系在一起。显然，本书的写作意图是要教育移居美洲新大陆的欧洲人后裔，希望他们牢牢记住：“我们的文字、工艺和思想中许多最好的东西脱胎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创造。这没有什么可耻的。相反，无视和淡忘这点才是可耻的。”

身为“蛮族”的欧洲人的开化始于公元12世纪，成于“文艺复兴”时期——海厄特说：

到了15至17世纪，西欧接受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艺术与理念，并迫不及待地吸收了它们……现代文明就此奠基。……在政治上，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如何诞生，希腊人如何探究其核心的力量和缺陷，民主理念如何为罗马共和国所接受并在现代社会的民主宪法中复兴，以及我们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直接来自希腊和罗马的思想。

的确，按照西方文化史教科书所下的定义：“文艺复兴”指复兴了异教（即

古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开启了回到基督教之前的古典视野——“人文主义者”的原初含义就是“古典主义者”。然而,这个在教科书中常见的定义恐怕有问题。没错,“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人文主义者把学习古希腊罗马经典视为教育的基础,他们确信,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作家在语法技艺、修辞术、历史认知和道德哲学方面都是欧洲人的楷模。问题在于,并非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文主义者都推崇古希腊罗马典籍。事实上,早在14世纪末就出现了一种“全然改变的态度”,即不是复兴而是拒斥古希腊罗马文明遗产的态度,以至于首次出现了人文主义与古典的全然割裂。^①一种新的政治感觉促使某些人文主义者拒斥古希腊罗马典籍中的历史认知和道德哲学,比如,出生于托斯卡纳的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 1380—1459年)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布拉乔利尼早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重镇佛罗伦萨完成学业,20岁出头进罗马教廷担任文书,随后成为教皇国的政治家,从政长达五十年。虽然是僧侣政治家,布拉乔利尼也是古典迷。30多岁时(1414至1418年间),布拉乔利尼借参加康斯坦茨大公会议期间造访如今位于瑞士、德国和法国的一些隐修院,收罗了不少古罗马作家的作品抄本,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西塞罗的六篇演说辞和昆体良的《修辞术原理》全本,“据说他用了32天时间以美丽的字迹全部抄完了这部著作”,史称自一个世纪前彼特拉克等人寻找并发现诸多古典抄本以来最重要的发现。^②罗马城是古迹成堆的地方,布拉乔利尼在教廷任职期间经常探寻碑铭,50岁那年还写下了《罗马城遗迹考述》。

然而,布拉乔利尼既是古典迷也是疑古者。他虽然热爱古书,却并不信任古代作家的见识。在他看来,当今的时代尽管可能很悲惨,仍然比古希腊罗马优越。这一看法并非由于他那个时代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天才们有了什么伟大的新发现,而是由于他感受到非常切近的来自西亚蛮族的威胁:布拉乔利尼的整个一生都在目睹土耳其人重新向西推进,并在去世前六年(1453年)得知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对中欧和西欧的威胁,使得具有古典学养的布拉乔利尼非常敏感。希罗多德的《原史》所记叙的古老的希波战争绝非仅是远古的故事: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尤其帖木尔(Tamerlane或Taimur/Timur, 1336—1405年)的辉煌战绩,让布拉乔利尼想起当年的克瑟尔克瑟斯(Xerxes,旧译“薛西斯”)。在布拉乔利尼看来,就战事规模和指挥才能而言,帖木尔的战功超过了古希腊罗马的所有

^① 这一观点在文艺复兴研究的专业学界早已经得到认可,参见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奚瑞森、亚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42页。

^② 参见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74、181、185页。

著名战役。他由此想到，古希腊罗马史家的见识未必就是万世宝鉴。如果当今时代有比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伟大得多的行动，为什么要崇拜古人的功绩，为什么欧洲人应该看重古代作家的见识？难道欧洲人不应该讲述自己的故事，提炼自己的政治经验？为了讲述意大利人自己的生存经验，布拉乔利尼写了哲学作品（如《论人生的悲惨》《贵族论》）、政治作品（如《那不勒斯国内贵族们反对斐迪南一世的阴谋》）以及史书《佛罗伦萨史》（*Poggii Florentini Oratoris et Philosophi Opera*, Basel 1538; *Poggii Florentini Historiae de varietate fortunae libri quatuor*, Paris 1713），还留下了许多饱含新政治经验的书信。^①

比布拉乔利尼晚一个世纪的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向这个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而且对后世产生了直接的巨大影响。在他看来，布拉乔利尼对欧洲人“要名垂不朽的野心和欲望了解很少”（布克哈特语，前揭书，162—163页）。马基雅维利学富五车，有丰厚的人文主义古典学养。然而，他的重要著述有一个基本特征：看重欧洲人自己的政治经验、鄙夷古希腊罗马人的教诲。我们在《君主论》的献辞中可以读到，马基雅维利说要向现代君王推荐他自己“依靠对 cose moderne [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钻研 delle antiche [古代大事]得来的知识。言下之意，他要传授的并非是古希腊罗马贤明的教诲，而是他自己研究现代大事的心得。这意味着古希腊罗马经典是无用的东西，对当今现实政治没有指导作用。大部头的《李维史论》表面上是一部古罗马史评鉴，甚至堪称一部关于古典文学的著作。按照人文主义的态度，这种著作应该把古史中的经验当作古典范例来研习，马基雅维利却在书中通篇对古典范例明褒暗贬。如施特劳斯所说，“《李维史论》一方面模仿古代，听命于古代作家的教导，另一方面则阐述全新的范式和秩序，实际上在与古典传统彻底决裂”。^②

马基雅维利与古典决裂的心志来自于这样一种抱负：让自己的祖国摆脱罗马天主教支配，成为独立自主的拥有主权的政治单位（共和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废黜基督教的《圣经》和古希腊罗马经典的权威。《君主论》各章标题用的是传统的学术语言（拉丁语），行文却是当时的意大利语俗语，这绝非偶然之举。我们知道，在罗马天主教主持下，中古时期的西欧形成了一个统一信仰的基督教共同体，拉丁语成为通行的书面语。“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用俗语写作，

① 参见 William Shepherd, *The Life of Poggio Bracciolini*, 1837/2010影印重版。关于布拉乔利尼政治思想的简短评述，参见沃格林：《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霍伟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62—166页。

② 参见施特劳斯《马基雅维利与古典文学》一文，见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刘小枫编，彭磊、丁耘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要表达的是西欧各王国力图摆脱基督教共同体的政治诉求。抬高“现代〔俗语〕作家”的地位，无异于抬高新生的日耳曼诸王国自身的地位。在16世纪末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已经发出废黜古人写作楷模的呼声——史称“反西塞罗主义”。布克哈特早就告诉我们，16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史家用意大利语写作，并非仅仅因为他们的拉丁语写作不能与优美的西塞罗风格争短长，“而且也因为他们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只能用活的语言来记载自己直接观察所得的现实的结果……也因为他们最终希望：他们对于事件进程的看法能够产生一种尽可能广泛而深远的实际影响”。^①虽然古希腊罗马文明被西方基督教官方判为“异教”，西方基督教的教养实际上以古希腊罗马经典为基础。人文主义作家的写作要求获得自己的政治位置，必然要废黜古希腊罗马经典的权威，否则俗语写作就永远只能是模仿者。

还可以提到法兰西王国的例子——路易·勒华（Louis Le Roy，1510—1577年），这位法兰西公学院的教授史称“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人文主义代表，精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翻译了不少古希腊经典，有“法语柏拉图”的美誉——直到今天，他的译作依然受到学界推崇。然而，与马基雅维利一样，勒华主要用母语写作，为的是记叙法兰西王国的政治经验：如《思考法兰西历史和普遍历史》（*Considération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et universelle*，1562年）、《论政治技艺的起源和卓越》（*De l'origine et excellence de l'art politique*，1567年）、《论君主制》（*Traité de la monarchie*，1570年）、《论君主政体的卓越》（*De l'excellence du gouvernement royal*，1576年）、《论宗教多样化在人群中引发的动乱或纠纷》（*Des troubles ou différends advenant entre les hommes pour la diversité des religions*，1599年）。勒华最著名的传世之作是《论变迁，或世间万物之千变万化》（*De la vicissitude, ou Variété des choses en l'univers*，1575年），这部作品内容包罗万象，尤其追溯了文学和武器从古至今的变迁——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勒华表达了马基雅维利式的厚今薄古论。^②勒华看到，在过去的一百年间，西欧人发现了好些甚至古人也不知道的东西：新的海洋、国家、种族、习俗、法律、矿物、蔬菜、动物、天体——这使勒华觉得，古希腊罗马圣贤的知识也是有限的。勒华甚至相信，任何伟大时代的到来都以一场伟大的战争为开端，文明的繁荣必须以战争为前奏——比如，希波战争之于雅典，亚历山大的征战之于希腊化时代，恺撒的征战之于罗马帝国文明。勒华觉得，帖木尔在纪元1400年前后的战绩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

^①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前揭，244页。亦参彼得曼《马基雅维利与但丁》一文，见刘小枫/陈少明编：《经典与解释10：马基雅维利的喜剧》，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② Werner L. Gundersheimer, *Life and Works of Louis Le Roy*, Genève, 1966; 亦参沃格林：《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前揭，168—176页。

始：正是在帖木儿统治期间，彼特拉克开启了从前封闭的图书馆，拂去蒙在古代作家优秀书籍上的灰尘。依据这样的历史观察，勒华尝试用非基督教的观念来描述历史和划分文明时期，由此催生了所谓“现代”观念。表面上看，勒华用来取代基督教历史神学观念的思想资源是古希腊自然哲人的自然“变迁兴衰”论，实际上，他的新历史观的感觉来自帖木儿的战争——倘若如此，我们很难断言，欧洲现代文明的奠基凭靠的是古希腊罗马的理念。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英格兰王国的培根——这位伟大的英格兰人文主义者直接受惠于马基雅维利和勒华的见识。^①历史刚刚进入17世纪之时，44岁的培根就用通俗的散文笔法写了《学术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 1605年，明万历33年），这仅是他计划写作的共六个部分的大著《伟大的复兴》的第一部分。从书名来看，培根似乎要“复兴”古希腊的文明遗产，其实，他的志向是用“新工具”和“新科学”取代古希腊罗马经典。几年之后，他以马基雅维利式的笔法用拉丁文写了《论古人的智慧》（1609年），表面上依从古希腊作家的教导，实际上表达的是与古希腊文明彻底决裂的决心和计划。^②早在《学问的进展》中培根就已经明确提出，不假思索地遵从古代权威，任何学问都会无所建树。他还说过这样一句话非常有名的话：

世界的老年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属性，而不是古老生命生活的早期时代。虽然在我们看来，那个时代要老一些，但就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说，那个时代才是年轻的。^③

这话的意思是：如今的欧洲人才是经验丰富的老人，相反，远古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倒是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从布拉乔利尼到培根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人文主义者自觉地拒斥古希腊罗马文明经验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其原因在于：西欧各日耳曼王国和城市共和国作为新政治单位的形成，促使各国智识人力图凭靠新的政治经验建立新的政治原则。可以说，“文艺复兴”标志着新欧洲诞生时欧洲新知识人力图摆脱古希腊罗马文明传统的决心：人文主义者在延续欧洲古老的文明传统的同时，也在与之决裂，以便打造日耳曼的新欧洲文明。

① 参见培根：《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第13篇和第58篇《论事物的变迁》（“Of Vicissitude of Things”）。

② 参见培根：《论古人的智慧》，刘小枫编，李春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③ 培根：《学术的进展》，刘运同译，孙宜学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4页。

基于上述例子，我们难免会对这样的说法心生疑问：“15至17世纪，西欧接受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艺术与理念，并迫不及待地吸收了它们……现代文明就此奠基”——西欧的“现代文明”真的奠基在古希腊和罗马的文明理念之上吗？再说，17世纪末期，西欧学界不是爆发了著名的“古今之争”吗？1688年，年仅31岁的法兰西文学青年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1657—1757年）发表了名噪一时的小册子《关于古人与现代人的离题话》（*Digression sur les anciens et les modernes*，1688年），这位著名戏剧作家高乃依的侄子早年在里昂耶稣会学校读书，因迷拜笛卡尔数学原理转而专攻数学哲学。在培根和笛卡尔的新科学精神激发下，年轻的丰特奈尔尝试用通俗对话体推广新科学知识，成为最早的法语科普作家。他的处女作《死人对话新篇》（*Nouveaux dialogues des morts*，1683年）模仿古希腊作家路吉阿诺斯的《死人对话》，让各色古人与各色今人（比如苏格拉底与蒙田）展开对话，其实是在贬低古人，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①仅仅三年之后，丰特奈尔又发表了名为《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1686年），假托与一位少妇对话宣传新天文学。^②这一次他造成了轰动效应，毕竟，太阳围绕地球转在那个时候还是人们的常识。从书名来看，《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显然受到伽利略在1632年出版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1638年出版的《论两种新科学及其数学演化》的启发。《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给时年不到30岁的丰特奈尔带来巨大声誉，伏尔泰后来称之为“把优美的文笔运用于撰写哲学著作”这一“精巧技艺”的首例。在丰特奈尔的激发下，法兰西学院院士、诗人佩罗发表了贬低荷马以及其他古代诗人的对话作品《古人与今人对比》（*Parallè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两卷，1688年），名噪一时。他贬低古希腊诗人的理由是：古代诗人的智识根本无法与现代欧洲哲人或自然科学家的智识相比，因为，17世纪的自然科学思维比古老的诗性思维更为可靠。毕竟，荷马在天文学、几何学、自然学方面的知识实在贫乏，甚至可以说糟糕透顶。在佩罗看来，知识和文雅得靠时间的推移来形成，因此，与当今的法兰西或英格兰相比，古希腊罗马文明远算不上开化。

1690年，英国文人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年）发表了《论古今学问》（*Essay up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一文，他对当时贬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欧洲主流知识分子说：

^① 全书共六卷，两卷题为“古代死人的对话”，两卷题为“现代死人的对话”，两卷题为“古代死人与现代死人的对话”。见Donald Schier编辑、笺注，Uni.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5。

^② 见Robert Shackleton编，Oxford，1955；英译本*Conversation with a Lady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London，1719）。

在哪些学科方面我们可以声称超越了前人呢？在过去的一千五百年内，除了笛卡尔和霍布斯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哲人能够具有这么崇高的地位。对于笛卡尔和霍布斯，我在这里不做评判。我仅仅要说，按照当今学者的意见，他们俩绝没能掩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其他古人的光辉。^①

坦普尔爵士的观点与丰特奈尔的观点针锋相对，可见当时的欧洲知识界的确有服膺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文人和学人。问题在于，为西欧“现代文明”打下地基的人并非坦普尔爵士这样的政治家和文人，而是笛卡尔和霍布斯这样的新派哲人，他们恰恰以背离古希腊罗马文明为己任。笛卡尔（1596—1650年）比培根小35岁，他追随培根提出的首要要求是改变思想“方法”，以便让欧洲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他用普通法国人都能看懂的法语撰写了小册子《谈谈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 1637年），但匿名出版。出于怀疑希腊人在数学和机械论方面是否比现代欧洲人更在行，他主张区分两类知识：凭靠数学理性认知获得的科学知识和源于熟识（*connaissance*）的偶然知识。在他看来，后一种知识只能通过语言和历史经历来获得。显然，欧洲人不可能靠古希腊罗马的语言和历史经历来获得关于自己的欧洲王国的偶然知识。因此，对于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来讲，掌握法语或大不列颠语应该比掌握古希腊语或拉丁语更重要，知道如今的欧洲哪怕最小的王国的历史经历也比知道古罗马帝国的历史经历更有优先性。笛卡尔的这一主张明确排除古典作家在教化方面的权威地位，切断了欧洲人的教养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关系，由此引出了改革人文主义文教科目的诉求：人文主义式教育只会把欧洲人培育成一个古代人，基于数学理性的新式教育才会把欧洲人培育成现代人。

霍布斯23岁时做过培根的秘书，在培根指导下研究古希腊和古典拉丁文著作。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志》译成了英文（1629年出版），后来还翻译出版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概要》（*A Briefe of the Art of Rhetorique*, 1637年出版）——按理说，霍布斯算得上学有所成的人文主义者。然而，他写下的名垂千古的《利维坦》（1651年）却凭靠笛卡尔的数学理性公开挑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披着基督教的外衣废黜基督教的政制法权，提出了著名的“自然状态”学说，彻底置换了欧洲政制的法理基础。如果霍布斯是公认的现代欧洲政治观念的鼻祖，怎么能把现代欧洲的“民主宪法”视为古希腊罗马思想的复兴呢？

^① J.E.Spingarn 编, *Sir William Temple's Essays 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 and On Poetry*, Oxford, 1909/2013, 页25（李春长译文）。

毕竟，我们在古希腊罗马思想中很难找到基于“自然状态”的契约论政制法理。

佩罗发表贬低古希腊罗马诗人的《古人与今人对比》的那一年（1688年），英格兰的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发动宫廷政变，废黜詹姆斯二世，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和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女婿威廉回国执政；次年，英格兰议会颁布《权利法案》确立议会式君主立宪制，剥夺了君主的主权，史称现代民主政制的先声……1701年，坦普尔的学生斯威夫特匿名发表了小册子《论雅典和罗马贵族与民众的竞争和争执》（*A Discourse of the Contests and Dissentions between the Nobles and the Commons in Athens and Rome*）。^①这篇论说文从讨论古希腊罗马的三种政体（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入手，过渡到集中讨论贵族与平民的冲突引发的政争，意在让时人思考英格兰民主新政的优劣。

国家的权力均衡一旦正式确定，最为危险和愚蠢的做法是对于民众最初的夺权行为作出妥协。这样做通常是为了逃避无理取闹，以获得安宁，或者把妥协当作仅供买卖的商品。这等于拆掉整体去满足一时之需，是江湖庸医的止痛疗法，将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迁就孩子，他会顺从满足；稍微迁就一下恋人，他就会满足，不再有其他要求，于是希望用小小的让步使民众满足。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哪一个公民大会，假如能找出一条例证，说明它在起初夺权时得到了一点点满足就从此安于现状，假如能找出一条例证，说明公民大会曾经清楚、提出或宣布他们的权限，那么我们才有希望通过思考、讨论和辩论调整权力均衡。然而，既然所有事实显而易见均非如此，我认为，在稳定的国家里不必要采取其他措施，那些被托付重权之人应该持之以恒，坚定信念，永远不要让步于民众的无理取闹，不要使国家有一丝的裂痕，否则无数的权力滥用和争夺迟早必定强行涌入。（Ellis 编本，页 115）

议会民主制对西方人来说的确不是现代才有的，古代的雅典和罗马都有平民议会建制。在斯威夫特看来，贵族与平民的冲突在任何时代都难免，最好的政制是权力均衡的政制或者说混合政制。在总结古希腊罗马的政治经验时，斯威夫特认为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是：

^① Frank H. Ellis 校勘、编辑、笺注本，Oxford，1967。中译见斯威夫特：《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李春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重大议事机构有时抛出无知、鲁莽、错误的决议，常常让我感到诧异。这使我意识到，民众的议会也会犯个人所能犯的所有问题、蠢事和邪恶。（同上，页 120）

按照斯威夫特所总结的古希腊罗马的政治经验，我们实在很难看出现代欧洲的民主政制观念以及新欧洲人“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直接来自希腊和罗马的思想”。

海厄特的大著是一部地道的欧洲文学史，作者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衰亡”和日耳曼“蛮族”文学在“黑暗时代”破土而生起笔，描绘了欧洲“蛮族”文学自中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成长历程。日耳曼“蛮族”相当于我国六朝时期才移居原西罗马帝国领地，这些“蛮族”在罗马天主教羽翼下走向开化的时候，我国已经进入高度人文化的宋帝国时代。海厄特专辟一章介绍“古今之争”（参见第 15 章《书籍之战》），可见他对现代欧洲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关系中隐含着的深刻断裂心知肚明，尽管如此，他仍然希望让自己的美国读者看到的是：现代欧洲文明与古典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有种种内在关联。海厄特显然意识到，无论现代欧洲文明凭靠商业和科学技术获取了多少财富、创造出何等强势的军事大国，文明年齿的短板毕竟不利于教化富裕且有航母掌控全球海洋通道的大国的国民。海厄特的这部大著当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欧洲文明，但在我看来，这部出色的著作其实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文明。毕竟，当我们热烈拥抱现代欧洲文明时，我们正在打造的现代中国文明难免会与中国古代文明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断裂——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牢牢记住：我们的文字、工艺和思想中许多最好的东西脱胎于我们古人的创造。欧洲人无视和淡忘希腊人的创造，其实并没有什么可耻——毕竟，他们与希腊人既不同文也不同种，如尼采所说，他们确实曾致力于这种无视和淡忘。相比之下，如果我们无视和淡忘我们古人的创造，才是实实在在的可耻。

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2015 年 6 月

中译本序二

在汉语学界中有相当多介绍欧洲文学史的著作，但大多从荷马直接跳到但丁，最多提一提古希腊的悲剧、维吉尔的诗歌或奥古斯丁的自传。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哲学、历史学、宗教学，尤其是古代晚期的教父学文献都被忽略。这样，中国的读者无法全面理解和欣赏西方的文、史、哲传统，也无法意识到，古代的经典在思想史上有多么深远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海厄特的著作显然特别重要，因为这位渊博的学者观察到，整个西方的文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自希腊人：“希腊人知道，戏剧、歌曲、故事和历史不仅是一时的消遣，由于其内容能够提供持续的养料，它们还是思想的永恒财富。这是并不十分富有或强大的希腊的发现。埃及比它更加富有，波斯则比它强大得多。但希腊人是开化的，因为他们懂得思考。他们把这个发现教给了罗马人……罗马人又把接受自希腊人的精神食粮传递给了整个西欧。这种食粮得到了基督教的净化和加强……”

这就是所谓“西方文化”的基本路线，但深入欣赏、了解和阐述该路途上的里程碑经典著作不容易，因为它需要一个前提条件：掌握多种语言。在欧洲思想史的道路上，海厄特是一位资深的向导，他书中引用的文献表明，他除了自己的母语英语以外还会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他论及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法律的方方面面。他的著作从古代文化的衰落开始叙述“黑暗时代”（公元 500 至 1000 年间）的情况和欧洲文明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他认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和语言是整个欧洲文学的“基础和纽带”，无论是意大利、法国、德国或英国的文人，都受了古希腊罗马的启发。海厄特用很多具体的例子阐明但丁、薄伽丘、莎士比亚、歌德，文艺复兴时代、巴洛克时代和 19 世纪的文人如何继承和发展这一共同的思想资源。

海厄特认为，如果没有古希腊和罗马的思想，西方的文字、工艺、文学、法学、政治都是不可能的。“鉴于我们缺乏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哲学体系的能力，完全靠自己建立起一个像罗马法那样坚实宏伟的体系简直是天方夜谭”（导言）。海厄特是苏格兰人，后半生大多数时间在美国任教，所以这句话中的“我们”应该指欧洲北部以及美国的民族。我们今天也许很少能听到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说自己的文化很“贫瘠”和“落后”，但实际上，大多数的精神因素就是从古希腊罗马传到欧洲北部的，然后又传到了全世界。

海厄特是一位古典学家，1938年开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他的第一部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是《荷马概论》(*An Outline of Homer*, 1935年)，这里翻译的是1949年问世的《古典传统》。这部著作自出版后陆续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著名古典学者柳沼重刚（1926—2008年，曾任筑波大学名誉教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陆续出版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普鲁塔克的译本之前，早在1969年就把这本书译介绍给日本读者，可以想见，他一定认为这是一本让日本读者了解西方古典传统非常优秀的著作。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部书是必读的工具书，因为中国近代文学也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然而，一般的学者只知道鲁迅受尼采和易卜生的影响，但不考虑尼采和易卜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古希腊人的隐喻、古罗马人的道德思想和中世纪宗教信仰的影响。海厄特知道，现代英语和现代法语有很多单词有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词根，在书中他还指出法国的波舒哀和英国的约翰逊如何根据拉丁语单词创造了一些新的法语和英语单词，但在中国很少有人意识到，现代汉语有多少思想概念和哲学术语受到希腊罗马传统的影响。海厄特说：“就我们大部分的精神活动而言，我们是罗马人的孙辈，是希腊人的重孙。”如果当今的中国人意识到现代汉语有多少元素来自古希腊和罗马的概念（“德先生”和“赛先生”只是其中一个例子），那么是不是也要问一句：“我们是罗马人的孙辈”吗？现代汉语是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受益者，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们的深层基础是欧洲的古典文化。如果有更多的中国人——和海厄特一样——能够掌握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海厄特很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文化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受益者。我希望他的中国读者通过这本著作，让“我们”的文化也“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思想生活的重要性……和唯一不朽的财富：灵魂”。

海厄特的著作也使我联想到德国学者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1886—1956年）的名著《欧洲文学和拉丁语的中世纪》(*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1948年)。无论是海厄特还是库尔提乌斯，他们的著作都强调欧洲文化的共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民族经历分裂之后，他们提笔寻找了一个共同的文化根源和纽带。但愿今天的古典文学研究能为分裂的民族指出一条共同的道路，提供共同的语言，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搭一座思想的桥梁和沟通渠道！

雷立柏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015年6月

序 言

我今年 83 岁，即将开始在耶鲁大学全职任教的第 58 个年头。到了学术生涯的这个阶段，我仅限于主持高年级本科生的小组讨论，每个小组只有 12 人，以便有时间经常与个人面谈。近年来，其中一个小组专注于莎士比亚，另一个专注于从爱默生到哈特·克莱恩的美国文学。

对禀赋较高的学生，我敦促他们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就像我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时那样（1947—1951 年）。垂暮之年的我仍然感激导师艾布拉姆斯（M.H. Abrams），他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了我鼓励。还要感谢教我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古典学者们：弗里德里希·索尔姆森（Friedrich Solmsen）、哈里·卡普兰（Harry Caplan）、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和戈登·科克伍德（Gordon Krikwood）。因为他们，我学会了深入阅读荷马、柏拉图、雅典剧作家、品达和希腊史学家，还有维吉尔、卢克莱修、贺拉斯、奥维德等拉丁语诗人。

在当今数字时代，学习古典语言甚至英语史的学生相对寥寥。指望出现不同情况不切实际，这种悲哀的现实促使我为吉尔伯特·海厄特的《古典传统》作序。

我在 1949 年海厄特的书刚出版时就读过它，它的明晰和详尽让我受益匪浅。两代人的时间过去了，我刚刚重读本书，觉得它仍然是无价的。

海厄特在开篇断言，我们的世界是“希腊和罗马的直接精神后裔”。这种说法在六十年前可能就不完全符合事实，在 2013 年更是很不准确。但我几乎不觉得这是本书的缺陷，与书中的论断相比，更重要的是他所描绘的英、法、意、西和德语文学中形形色色的影响与联系。他的学识渊博而透彻，他善于讲得通俗易懂，又不贬低或过分简化重要的文学想象作品。

范围的确是本书的长处：从但丁和乔叟到弥尔顿和蒙田，再到莎士比亚、歌德和浪漫派诗人，最后是詹姆斯·乔伊斯。

海厄特以艾略特为例，强调了古典传统与个体天才间波澜不惊的传播。但艾略特本人的其他作品表明，文学传承并不那么一帆风顺。我承认自己对此感兴趣，因为我一生都在讲授和著述关于影响带来的焦虑，关于后世作家创造性地误读前人作品，从而对其造成污染时的喜悦和痛苦。海厄特也许不乐意听到他的阿卡迪

亚牧场其实是雷区，不过他为研究影响过程的学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我仅举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在描绘浪漫主义高峰时期的意大利大诗人贾科莫·莱奥帕尔迪伯爵（1798—1837年）时，海厄特写下了这样一段优美的文字：

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古典作家是伊壁鸠鲁主义者卢克莱修，后者相信人类的诞生和生命完全是意外，并没有别的意思；自然对我们既不友善，也不怀有敌意，而是漠不关心；生命唯一有意义的目的是获得平静而安定的幸福，其途径是适度和精心挑选的欢乐以及对宇宙的睿智理解。和卢克莱修一样，莱奥帕尔迪也是唯物主义者；和前者一样，他同样赞美希腊神祇的魅力，尽管他知道事实上它们与我们的世界没有真正的联系；和前者一样，他用吃惊和同情的目光注视着人类的激动和忙碌，就像我们注视着被坠落的苹果砸中的蚁丘。不过，莱奥帕尔迪的结论是，由于生命是徒劳的，它只会造成残酷的痛苦，死亡应该受到欢迎；而卢克莱修的结论则是，如果正确地理解和管理它，生命还是可以忍受的——这不仅是莱奥帕尔迪和卢克莱修的差别，也是许多现代诗人和几乎所有希腊—罗马诗人的差别。即使在希腊悲剧中，生命也并不是毫无希望的，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仍然包含了高贵和美。莱奥帕尔迪从未领悟到这个真谛，这也许要归咎于疾病给他的身心造成的折磨。至少，他没能有意识地领悟到这点。不过作为艺术家，他还是掌握了它。古典诗歌对他最大的帮助，或者说他的作品中最堪与伟大抒情诗人相媲美的地方在于，他眼中的悲剧人物具有雕塑般鲜明的轮廓，而在描绘它们时，他像希腊人那样结合了深沉的激情和完美的美学掌控。

海厄特对莱奥帕尔迪的评价完全正确，但对卢克莱修的判断过于积极，对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雅典悲剧的看法则犯了高贵的错误。事实上，卢克莱修甚至比莱奥帕尔迪更加消极，而雅典悲剧中的希望与《李尔王》和《麦克白》中的相当。不过，海厄特的渊博仍能启发思考。他让我回归埃斯库罗斯、卢克莱修和莱奥帕尔迪，尽管他本人不愿吸收他们强烈的消极。

我的研究生导师弗雷德里克·波特尔（Frederick A. Pottle）为詹姆斯·博斯韦尔写过传记，还是华兹华斯和雪莱专家。他教我对所有的文学学术作品都问一句：“这有用吗？”按照这个来检验，海厄特的《古典传统》是上佳之作。我拥有异乎寻常的记忆力，特别是对诗歌，但我的头脑无法容纳本书向我展现的重要文学传统的整个庞大轮廓。在这个黯淡无光的时刻，它提供了可敬而持久的帮助。

此外，由于海厄特的渊深，它还带来许多惊喜。在阅读俗语欧洲文学时，你